军事理论

加强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

近年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与利益的全球广式分布、威胁的多元多向相比，仍然不足以应付，这种差距可以通过依托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进行弥补。

□ 倪　鑫　云大鹏

所谓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就是根据地缘战略环境、面临安全威胁和我军战略任务，将军力预先部署于可能威胁方向、国家核心利益聚集地区以及决定军事力量打赢的关键节点而采取的战略行动。它着眼于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是统筹地理空间、新型安全领域以及海外利益攸关区于一体、以能力为核心的力量配置，重在展示战略指导重心前移的进取精神和表达战略诉求、平衡战略布势，强化前沿威慑与实战准备，达成遏制威胁、管控危机、打赢战争之目的。

坚持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是贯彻积极防御战略、加强战略运筹的实际行动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是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性、支撑性部分。对力量如何进行“排兵布阵”，是战略运筹与管理的重要形式，体现军事战略要求。美军的全球战略历来强调战略预置，它的预置方式分为物理空间与认知空间两种方式，通过三大途径实现：一是在世界各地驻军实现前沿部署，建立固定的战略支点、构建战略支援区域，达成战略快速反应的目的，这是美军战略预置的主要方式。二是通过以航母为主体的“移动国土”直接到达任务区域，达成移动式战略存在，这是美军战略预置的重要方式。三是针对战略对手而建构的威慑形象认知预置，通过演习、实战等将“世界第一”的形象“预置”到被威慑对象认知中。这充分证明，无论军事技术多么发达、军事能力多么强大，进行力量的战略预置永远是重要选择。

从我军军事战略看，力量怎么布势是一个战略抉择的重大问题。虽然我军积极防御战略在各个时期侧重点不同，但共性之处就是战略总体特质是属于内敛型的，战略管理能力不足、主动进取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军军事战略的僵化狭隘理解。潜意识里把军事力量战略预置看成是对外军事扩张与挑衅，缺乏政策合法性与行动合理性。其实，无论中国怎么做，“军事威胁论”永远是某些国家的攻击借口。坚持和平发展并不排斥积极进取的军事战略，军事力量布局调整在战略态势营造上同样具有威慑战争、维护和平的价值，甚至有时为了和平不得不靠打一场仗。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定，一举扭转了我在东海的战略被动态势，以维护我海洋权益、制止日本军事冒险为基本条件，保持了更高层级上的“和平”状态，这体现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二是对物理空间的主权属性与其支持作战的自然属性产生认知混乱。最突出问题是以空间的主权属性干扰其作为军事行动承载的自然属性。如，重视土地的主权属性，淡化其作为陆地的军事行为支撑功能，使得军事活动过度受到国家政治、外交政策等大环境因素挤压与制约，轻视陆地在支持军事活动的自然属性价值，最终过度强化军事力量预置的政治考量而束缚了军事价值考量，或者说过多抉择了政治而忽略了军事，影响了军事战略布势、军队打仗能力塑造。再如，当前军队重点研究是如何打赢的问题，而对思考以什么样方式结束战争、如何搞好后续军事占领和领土控制则考虑不多，即处理“打”与“收”的平衡不够，这其中既关涉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也含有对领土的政治属性与军事属性的把握问题。我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军事的观点，合理抉择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内在平衡性，充分发挥军事的能动性。三是对力量预置主体的机械性认定。“大陆军”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我们思考力量预置时鲜明的“陆地思维”，先入为主把陆军作为预置主体，而陆军的配置一般需要具有确定性领土主权保障的陆地来实现，尤其是海外力量预置更需要用谈、租甚至利益交换方式来确保供给，而这些单靠军种甚至军队自身力量难以完成。

其实，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主要是发挥以“点”控“线”、联“线”成“面”的军事辐射、链接功能，它应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军民融合发展理念和加强国际安全合作观念，坚持全局统筹、分区负责与关注太空、网络等新型安全领域威胁相结合的战略布势。具体说，在主体上综合陆海空天网等军事力量和预备力量，在类型上涵盖常态化军事存在、动态性战略预置以及民用保障支点的固定布势，任务上既考虑担负前沿存在与威慑又要履行抢险救援等国际道义责任，目的在于既强化整体军事力量的综合布势又传播国家和军队正面形象。



坚持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是我军贯彻强军目标要求能打胜仗的重要手段

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是我军使命所在，力量布局必须要服务于这个根本指向。

战争形态演变，并没有否定力量布局的重要意义。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但这并没有改变地缘优势在战争制胜中的关键性作用，大国依然强化对世界重要海洋运输通道的占领与控制，依然强化对热点敏感地区的激烈争夺，这说明传统军事控制观仍发挥不可替代作用。同时，一般战争形态的定位并不能决定每一场战争的具体形式。从信息化与机械化的辩证关系看：信息化是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它没有否定机械化，反而是发展了机械化，信息化战争也没有完全剔除掉机械化战争的基本价值，加之我军本身正处在机械化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所面临的具体战争很可能是多种战争形态的综合体，不存在“一招通吃”的制胜规律。因此，我们必须要摒弃“战争形态绝对化”的僵化认知，从我军面临的真实战争形态、具体战场环境、每一次作战实际来思考和把握军事力量预置具有的打赢价值。

战争制胜机理的改变，并没有否定军事力量靠前部署的价值。有人讲，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制胜机理，战争全域、全纵深进行，军事技术、武器装备赋予军事行动“直达战略”的性质，时空关系已发生改变，单纯的空间控制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已没有实际意义。不可否认，信息技术、虚拟网络等“异化”了人类“时空观”，信息资源的获取只需连接网络空间一个节点即可，无需考虑现实时空的限制。但对军事来说，信息要素的基础性、主导性作用，既没有改变“战争胜负取决于人”，也没有否定军事活动的时空依赖。在这样的条件下配置军事力量，绝不是那种粗放式、概略式、追求数量规模式的力量配置，而是基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精确配置力量、精准使用力量，它体现的是对以“时间换空间”为特征的传统军事时空观的超越与扬弃，是一种精准时空观下的力量配置。因此，瞄准战争与威胁的特定时空，进行力量战略预置至关重要。美国正在加紧实施的“睡莲计划”，其根本着眼点就是关键时刻的“激活”。近年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与利益的全球广式分布、威胁的多元多向相比，仍然不足以应付，这种差距可以通过依托军事力量的战略预置进行弥补。

我军面临威胁多方向、连锁性，使得军事力量预置具有应对战争的可靠性。究竟打一场什么的战争，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对手。历史警示我们，往往不是判断的主要威胁方向先出事，反倒是次要方向先出事。这要求我们从加强军事力量战略布势来搞好妥善应对，搞好战略预置的总体研判，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促进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协调发展，形成全局一体、互相策应的战略布局，克制战略“短板”与“盲区”，保持国家战略全局平衡和稳定，既搞好“现实态”军事存在威慑，又能备打赢之需，对抗威胁演变、管控危机升级。

军事战略

加强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

□ 高文俭

新领域特殊战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是在太空进行断源毁网、网络空间实施击点瘫网，以定向能、动能、病毒等非传统手段及方式实施的作战行动。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是指舆论工作者针对公众对所发生新领域特殊战的舆论意见，进行引导、控制和处理，创造有利于我方取得战斗胜利的公众舆论环境，赢得国际社会和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工作。开展好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要遵循网络时代舆论宣传工作规律，紧贴部队实战需要和公众舆论动向，赢得舆论斗争主动权。

建好舆论工作力量。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要搞好统筹协调和战略规划工作，使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在高层切实有人抓有人管。要着眼网络信息安全，成立舆论工作指挥控制中心，负责开展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的具体计划和日常组织领导。建立全军信息技术中心和信息保障基地，加强新领域特殊战人员实体和武器实体力量建设，加强虚拟空间软杀伤手段建设。大举招募计算机、工程、数学、外语、航空航天、测控、卫星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招募软件工程师、IT安全专家、信息战专家等，不断充实舆论工作实体人才力量。对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人才的培养，由国家提供技术培训与支持，建立全军新领域特殊战媒体人才信息库，采取院校培训、军地合训、组织集训等方式培养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对党忠诚、业务精湛、熟悉军事、作风硬朗的新领域特殊战媒体人才队伍，努力培养一批“网络斗士”和“太空勇士”。

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自古以来，作战双方都强调师出有名，开展舆论工作同样如此，只有具备正义性，才能占据斗争的制高点。在新领域特殊战中，要充分考虑世界的多样化特点和现实发展状况，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和愿望，为各国采取平等对话与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提供条件。一方面，要做到“棋高一招”。就是斗争的出发点要高于对方，不能被敌方牵着鼻子走，以致处于解释、辟谣和反驳的不利境地，提出比敌方更加高明的主张，从而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坚守正义、维护和平、被迫反击的一面，敌方维护霸权、侵略扩张的非正义的一面，进而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同情。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在制定太空战、网络战等新领域特殊战的国际条约、规则时，我们尽量作为发起国积极组织，如果别国率先发起我们要积极参与，比如限制激光、微波等定向能武器的研制，限制网络病毒武器向民生支撑领域的攻击，网络空间的自卫权，国际网络安全协议等，要争取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营造有利舆论氛围。全媒体时代，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消弭了内宣与外宣的界限，一条消息、一个视频，不仅短时间内在国内发酵，甚至可能快速传遍全球。因此，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应树立内外宣一体的理念，以全球的眼光和大宣传的视野，把外宣方面的有益原则和技巧，运用到舆论宣传中，发出我军的声音。要充分用好党报军报、国家和军队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官方舆论场，用好自媒体、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加大新领域特殊战军事信息对社会的推送投放力度，积极主动与民间媒体开展合作，建立常态化的定期沟通协调机制，使官方军事新闻舆论场的影响力，辐射到以网络空间为主的民间军事新闻舆论场。比如，针对国外军队积极发展高能激光和微波的定向能武器，并借以对付处在任意发射阶段的弹道导弹问题，要通过军事外交、国际军事论坛、国际军演等各种平台，阐发我们的立场，必要时要措辞严厉地予以回击。针对外国军队培养网络“超级战士”，发起复杂难以破解病毒攻击的网络战问题，我们要成立网络防御中心，建立自己的编程人员方阵，建设能够屏蔽敌意网站的中国网络过滤系统，来捍卫互联网国界，从而使国际上理解我开展新领域特殊战是正义之举。

坚决回击恶意炒作。当前，敌对势力对我新领域特殊战的恶意炒作时有发生。在全媒体环境中的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领域，正面宣传和负面宣传之间始终进行着没有硝烟的舆论争夺战。在这个战场上，正面宣传不主动去占领阵地就会被负面宣传所夺占，不主动塑造自己就会被别人所改造，不主动引导就会被别人所误导。因此，舆论工作应树立主动作为的理念，着眼于巩固已有舆论阵地和抢夺舆论新阵地，确立主动积极传播的意识，及时筹划设置议题，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太空等战略博弈和军事角力的新领域，开展舆论工作既要准备“硬战争”，也需要准备“软战争”。我们既要不动声色地组建并训练网络战部队和太空战部队，又要随时应对敌对势力的炒作，不失时机地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扎实开展研究演练。依托全军军事科研院所，专门对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展开专题研究，为舆论对抗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建设网络“靶场”以训练应对已知和未知威胁的网络部队、对整体网络行动进行新的分析、详细列出军方现有的网络技能、设立网络首席顾问监督我国对所有入侵数字威胁的防御，设置各种可能发生的舆论对抗情况，演练如何发声、发出什么样的声。实行军、民网实体隔离、统一派送并更新防毒软件、搜集并分析黑客攻击事件样本，以及发布资讯安全通报供全军遵行，组建一支网络战蓝军力量，在每年开展一至两次网络对抗的同时，展开舆论对抗，检验红方舆论工作效果。对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要进行法律评估，即运用国内法、国际法对开展舆论工作的正义性、手段、实际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舆论工作。开启大国之间新领域特殊战舆论工作谈判机制，外交部根据需要实时发声，新领域特殊战舆论部门，利用好一轨或一轨半国家级或半官方军事论坛，并建立国家层面的军方谈判协商机制，实现明谈暗打、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营造有利于我的舆论导向和氛围。

抓住绿色机遇　实现绿色发展

□ 张雅静　张晓媚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绿色”作为“十三五”规划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四大理念相比，绿色发展理念内涵更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绿色发展将引领中国实现绿色崛起。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日前，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举办的“2015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全国的近70位代表出席论坛，会议围绕绿色发展理念、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治理、产业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意义重大，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代表认为，当绿色生存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绿色理念也走入人的心田，绿色理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需要绿色理念的指引，没有全民绿色理念的树立，就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绿色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仍处于高碳水平，要想尽早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有代表指出，要尽快把绿色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成为引导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的指南，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绿色理念的社会新风尚，为绿色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是“十三五”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针对前不久闭幕的巴黎气候峰会，有学者认为，《巴黎协定》有利于中国的绿色发展，巴黎气候峰会达成了覆盖近200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巴黎协定》，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各方共识。气候大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确定为低碳绿色发展，标志着全球从过去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形态向去碳化的低碳绿色经济转型，奠定了世界各国广泛参与减排的基本格局。《巴黎协定》标志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改变，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中国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也将发挥推动作用。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维护生态安全刻不容缓。最近几年全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空气污染不断加剧，国家虽然在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环境状况不断下降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代表指出，我国还需继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在人力、资金和装备技术上加大投入，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以确保生态安全。加强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举措，目前江苏省发布了历年来中国第一份聚焦大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政府“一号文件”，史上最严的《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也获江苏省人大通过，今后各省市也要加快环境治理方面的立法。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是“十三五”重要目标。经济新常态为中国绿色发展迎来了战略机遇期，只有全方位实施绿色发展，才能真正“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有学者指出，科技创新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突破口，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把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可持续发展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大幅提高工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创新政产学研用合作体制机制是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倡议成立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国家创新服务联盟，旨在整合政产学研用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与会代表还探讨了绿色发展的评价方法、绿色金融等问题。推动绿色发展需要制定一个科学有效的绿色发展的评价方法。北京林业大学在生态文明评价方面有成熟的研究成果，下一步，要研究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评价方法，以此推动省域绿色发展的实现。有代表指出，绿色金融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是金融企业适应绿色发展的明智之举，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

观点综述

敬告读者

本报春节期间休刊两周（2月1日至2月14日）